

同治西北战争期间的 粮食、饮水与人口损失*

路伟东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摘要] 本文从人口史的角度出发, 主要关注同治西北战争期间的粮食、饮水与人口问题。研究表明: 造成同治年间西北人口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不是战争杀戮, 而是与战争相伴而来的大面积荒歉、灾害以及瘟疫, 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粮食短缺与饮用水源污染。入清以来, 西北粮食市场过度商品化, 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粮食供应体系在战争状态下极为脆弱, 这加剧了战时粮荒程度。与官方集中式的粮食仓储相比, 民间分布式的粮食存储方式在战争状态下应对粮荒的能力更强、更持久, 也更有利于城市的防守。

[关键词] 同治西北战争; 粮食; 饮用水; 瘟疫; 人口损失

同治西北战争作为近代西北人口发展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 不但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人口损失, 也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极大地改变了区域人口的结构。在传统人口史那种宏大的、结构性的叙事方式和研究范式中, 战争只是人口变动的一个背景, 读者看到的大多是战争导致的人口变动的过程、结果, 以及与之相关的特点和规律探讨与总结。相反, 对于隐藏在战争这一表象之下造成人口损失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和要素, 比如粮食和饮用水等, 则少有讨论。

就现有研究来看, 真正聚焦于战时粮食、饮水和人口损失的成果较少; 有所涉及者, 也大都把粮食和饮水作为影响人口的一个要素, 论述较为简略, 缺乏翔实的文献佐证和深入的文本分析^①。基于此种研究现状, 笔者以同治西北战争为例, 对战争状态下的粮食、

饮用水与人口损失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希望这一研究除了可以从不同侧面更加立体、全面地展现同治西北战争外, 也能够为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传统战争与人口损失关系, 系统把握中国人口发展历史脉络提供一些帮助。文中不足之处, 恳请诸位方家批评指正。

* 本文为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2017 年度课题研究类项目“清代西北回族人口与回族经济”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变迁与区域社会的发展”(批准号: 16JJD770012)的阶段性成果。

① 相关文章可参见曹树基、李玉尚:《太平天国战争对浙江人口的影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5 期;李楠、林鑫:《太平天国战争对近代人口影响的再估计——基于历史自然实验的实证分析》,《经济学》2015 年第 4 期;杨志娟:《清同治年间陕甘人口骤减原因探析》,《民族研究》2003 年第 2 期;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商务印书馆 1946 年版;路伟东:《1860—1864 年天京的粮食供应》,《近代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

一、同治西北战争与 区域人口损失

同治元年(1862年)初,西北战争起于陕西渭南,不数月,战事即扩大至关中各州县,此后十年间更是燃及陕、甘两省大部。战事所及之处,城堡屡陷,田荒粮尽,人烟断绝,熟地变成茂林,沃野尽为焦土,“残杀一日,辄死人民数万,血流成渠,尸积如山,伤心惨目”^①。这场战争除了直接造成大量青壮劳动力死伤外,还严重耽搁了农事,致使作物无法正常播种、收获。而官兵与民争食又极大减少了民间的粮食储备,严重降低了普通民众抵御荒乱的能力。因此,战争波及之处普遍发生饥馑,各地粮绝,人口损失惨重。

同治三年,陕西凤县兵燹后饥馑,“斗米价值二千五六百文”^②。同治五年三月,兰州城发生粮荒,“斗至三四十金无巢者,道殣相望。饥民割死人肉食之,继乃杀人而食”^③。庆阳董志原广袤数百里,地沃民丰,号称“陇东粮仓”。回军“十八大营”占据期间人口陡增,不久即发生粮荒。同治七年(1868年)麦熟后,回军抢先刈割,民人仅“捡拾遗穗余粒,少延残喘,遂致斗粟卖钱八串,后至十二串亦无可买之处。饿殍载道,人兽相食,其惨不可胜言”^④。同年“闰四月,泾州大饥,人相食,新瘞死尸食之殆尽,秦安县亦大饥,斗粟钱十千有余,十室九空,草根树皮掘食净尽,死者无数”。兰州“所需米麦已不登于市,民有衣锦怀金携妻子投黄河以死者,饥丐偷掠小儿为食”^⑤。隆德县“岁大歉,斗米二十五六千文不等,人相食,死者塞路”^⑥。战后平复全县尚无二三十家。根据方志记载的不完全统计,战争持续的十余年间陕甘两省至少有68个厅县和地区发生粮荒,其中人相食的记载

多达11次^⑦。

以上种种惨相,凡战争所及几乎每处皆同,“民不死于回,即死于勇,不死于回与勇,即死于瘟疫、饥饿”^⑧。现有研究表明,战争持续短短十余年间,西北人口损失总数以千万计,损失比例可能超过总人口的六成^⑨。

二、战时各方对粮食的 争夺与乏粮之困

行军之要,首重粮饷。左宗棠西北用兵,对粮食供应就极为重视,但“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⑩。粮食为大宗物品,分量重,易消耗,以驼运粮“日行一站,越二十站,驼之料,驼夫之粮,已将所负者啖尽”^⑪。西北运粮之难,由此可见一斑。与官军相比,战时回军及地方民众的粮食供

① 民国《创修渭源县志》卷六《武备志·回变官民死事纪略》。

② 光绪《凤县志》卷九《纪事志》。

③ (清)杨毓秀:《平回志》卷三。

④ 民国《重修灵台县志》卷三《武备》。

⑤ 宣统《甘肃新通志》卷二《天文志·附祥异》。

⑥ 民国《重修隆德县志》卷四《拾遗》。

⑦ 袁林:《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5—1699页。

⑧ 光绪《洮州厅志》卷一八《杂录》。

⑨ 研究表明,1862年至1880年间陕甘人口损失在2000万左右,损失比例超过60%(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718页)。这一时期,陕西省还遭到了光绪大旱灾的沉重打击,人口损失较重。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灾荒造成的陕西省损失的人口大概接近1/5。(路伟东:《同治光绪年间陕西人口的损失》,《历史地理》第1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0—361页)

⑩ (清)左宗棠:《答皖抚英西林中丞》,(清)左宗棠著,刘泱泱、廖运兰校点:《左宗棠全集·书信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01页。

⑪ (清)左宗棠:《与黄恕陕少宗伯》,(清)左宗棠著,刘泱泱、廖运兰校点:《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375页。

应更缺乏保障,乏粮之困尤重。

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初三,回军攻陷盩厔县临川寺,黑河以东除甘沟、豆村两堡寨之外,余俱被焚掠。南集堡乡约刘廛等人,“侦知回匪不可以力胜,遂凑灰面买毒药和之,分装小口袋,俾壮丁伪为负粮逃难状,回逆数十人突来,均弃袋,入城固守。贼抢面袋返驻尚村镇,被药面毒死,其尸七八车”^①。回军见粮即抢,运回即食用,粮食匮乏惨状,由此可见一斑。为增加粮食供应,回军对于那些放弃抵抗,主动或被动纳粮献贡者,给予庇护,不少汉人因此而免于祸。这样的例子很多,如礼泉县的很多村庄,在回兵未到之前,就派人前往接洽,商讨有关支差事宜,并供给粮食、草料等,村民多得活命^②。

同治战时,众多城堡无力久持,最终沦陷,粮食给养短缺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战后官私文献中有大量旌表捐粮守堡活民的记载,如皋兰南乡侯回锡战争期间就将家藏小麦二十余石,慷慨散给邻里而不取值。会宁郭家岔堡郭树枏积有粮石,乡邻避于其堡者一千三百余人,悉赖存活^③。凡记于史志而旌表者,事多鲜见,志书中广为记载的此类故事恰恰是战时粮食普遍短缺的最好反证。

治所城市为辖区政治、经济中心,人口原本就众,又涌入大量逃难人口,需求骤增,给养缺乏问题较为突出。比如省城西安原有人口十余万^④,战时“又添避难男妇万余人”^⑤,自同治元年六月初四日被攻,道里梗塞,米面盐炭一切日用之物,皆极度匮乏。甘肃提督马德昭等人曾多次督率官兵到近城河滩草店等地方抢运给养,双方为此攻伐数次^⑥。临潼为省城西安门户,城小而积储少,被围以后,所有给养仅靠骊峰一线可以转运,攻守双方亦于此处发生激烈争夺。由于城中极度乏食,“难民徒手入城者,数日相继饿死。……

难民争欲出城挖菜充饥,禁之不可……病饿死者,日计百余人;出城被戕者,日计数十人”^⑦。被围城市断粮后的惨状,由此可见一斑。

为解决粮食问题,守城者百计皆施。有抢粮开源者,如同治二年(1863年)礼泉县城被围期间,守城者就于四月二十一日乘打斗间隙,开北门抢收熟麦三日^⑧;亦有减员节流者,如固原州城被围期间,守城者“每夜择老幼乘间用布缠之缒城下”^⑨,史称小民赖以脱祸者不可数计。凤翔围城期间,亦有“阖城百姓男妇聚集环跪,乞求开城逃生”^⑩。实际上,城中老幼病残等人进城本为逃命,况其中有原本就住城内者,大兵围城之下,这批人自愿离城外出的可能性不大。真正的原因应该是,老幼病残根本无力守城,只会增加粮食消耗,城中给养有限,将这部分人口驱至城外,可以节约粮食。陕西按察使张集馨在同治二年三月的一份奏折中就称,“省城难民数万,闻抚巡意欲分散各属以为移民就粟之举,免耗口食,计亦甚善”^⑪。所谓难民分散各属以

① 民国《盩厔县志》卷八《纪兵篇》。

② 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

③ 光绪《甘肃新通志》卷七三《人物志·孝义上》。

④ 史红帅:《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9—415页。

⑤ 《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庚辰)托明阿、瑛荣孔广顺奏》,《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一五,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

⑥ (清)杨毓秀:《平回志》卷三;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七三《纪事七》。

⑦ (清)谢恩浩:《再生记》,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⑧ 民国《续修礼泉县志稿》卷一一《兵事志》。

⑨ 光绪《甘肃新通志》卷七三《人物志·孝义上》。

⑩ (清)余畴澍:《秦陇回务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回民起义》第4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页。

⑪ 《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壬申)陕西按察使张集馨等奏》,《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三九。

为移民就粟之举,实则逐出城外自生自灭而已。

有限的粮食能保证本城堡人口基本需求已属不易,若有外来人口分食,则更不敷用。因此,乡居小民想要进入附近的,尤其是那些根本与自己无关的堡寨可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泾州人完颜瀛,战争期间曾奉父就食凤翔,及归,途经灵台县属之三里原时遇有大兵,乃负父往投附近堡寨。堡人闭门不纳,“瀛长跪哀恳请继其父上城,已寄宿堡门外。堡人许之,天明贼去,附近各村堡悉被掠,此堡独存,堡人谓瀛孝感所致,遂增饼饵,资以归奉”^①。堡寨因孝行感动神灵而终获保全,显系无稽之谈。堡人关闭堡门不纳生人,有安全方面的考虑,但恐怕也有人多增加粮耗的担忧。

三、战时饮用水污染与瘟疫流行

粮食与饮水皆为维持生命所必需,缺一不可。相对粮食而言,人体对饮用水的需求更加强烈,也更加迫切^②。整个西北,大部属于干旱、半干旱区,用水问题历来比较突出。如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即清代的延、榆、绥、鄜诸府州,用水就极为困难。1973年的调查显示,一般年份,延长县约有40%的人口饮水困难,平均每年约15%的劳动工日要用于生活取水。在黄陵县的部分乡镇,这一比例更是高达30%以上^③。关中地区虽然水土条件相对较好,但是,也有相当多的地方吃水困难。比如渭河以北旱原以及渭河以南的秦岭北麓高地,地下水埋深多在百米以上,土井一般深二三十丈,“各村用窖储雨水以资饮,夏日却天旱之时,井水不足,窖水东西又无,往往有十余里取水于谷者”^④。其他诸如富平、蒲城、郃阳、韩城、大荔等州县,土井亦极深,取水要使用双下索辘轳汲水,需数个强壮劳

力协作方可,用水也相当困难。是以乡村市镇及至治所城市,凡有水井之处,多有绳制,从挖井、维护、盘绳、汲水时间和汲水时的劳动组合等,均有相当完善的制度^⑤。

陕省各县,尤其关中渭水南北西、同诸府各县,是战争的发源地,也是战时打斗最激烈的地方。在日常饮水就普遍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战时不可能不发生用水困难。然而,翻检各类官私文献,尤其是事件亲历者的记述,整个战争期间各地饥渴缺水的记载似乎并不多见,给人最直观的感觉是,战争期间,饮用水问题并不严重,缺水造成的影响似乎也远没有缺粮造成的影响严重。但实际上,真实的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从有限史料中可以管窥战时各方围绕水源及饮用水展开的激烈对抗与制衡。不少地方,尤其是那些长期被围困的人口聚居之处,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缺水问题。比如礼泉县,同治二年正月间,大小难民逃入城中,至五月初,官府开始组织人在城内掘井,可见此时城内已有缺水之虞^⑥。甘肃很多地方地势高亢,平时饮水就很困难,战时被围,极易陷入缺水困境。比如陇西西县武阳龙锋堡,自同

① 光绪《甘肃新通志》卷七三《人物志·孝义上》。

②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一个健康的成年人,在没有任何食物的情况下,只要有足够的饮用水,其生命体一般可以维持一个礼拜左右,而人类全饥饿下的生存极限甚至可以达到20天以上。相反,如果只有食物而无饮用水,大概只能存活3天。邓开盛、程明亮、王小林、穆茂、杨国辉、郑松、蔡秋:《高矿物质水与人类生存极限的关系》,《中华医学杂志》2011年第91卷第27期。

③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水利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页。

④ 民国《澄城县附志》卷三《政经志》。

⑤ 胡英泽:《水井与北方乡村社会——基于山西、陕西、河南省部分地区乡村水井的田野考察》,《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⑥ 民国《续修礼泉县志稿》卷一一《兵事志》。

治二年二月被围,长达四月之久,“堡中至煎败皮捣树屑以食,绝水又死者甚众”^①。部分城堡,甚至因缺水而被攻破。比如整屋县的史务堡,同治三年五月中旬遭到围困,“堡在半山腰,其险可守,唯不能凿井,引渠水食用。贼侦之截流,人畜多渴死,城遂陷”^②。

战时小民,尤其是老幼妇孺自我了断的主要方式,除了自缢、跳崖等外,主要是投井。官私史料中此类小民跳井的记载极多,不可胜数。如西安围城期间,剿洗回族的消息日夕数警,城内回妇皆持剪蹲守井口,随时准备自尽^③。又如临潼县姚家堡被围七昼夜不克,民如惊弓之鸟,闻县城被攻破,即跳崖投井死者有千余人^④。战时从乱如麻,水井很难及时打捞清理,历经酷暑盛夏,井水遭到污染,饮水遂成相当问题。同治元年八月,胜保带兵入关,省城西安附近,“荒烟蔓草,无从觅食。井中皆有积尸,求水亦不可得”^⑤。此时开战仅有数月,省城附近大量井泉就因小民投井而遭到污染,无法饮用。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上谕称:“闻军士前因村镇井水不洁,饮之多生疾病,现更多疯癫软脚之症,回性凶狡,恐其于河水上流置毒,不可不虑,可多凿新井以汲水,或多置解毒之药于水中,并将病疫之人另为一营,派弁照料,勿令仍居大营,以免传染。”^⑥官兵饮水尚且如此,小民饮水更难保证。战争起后,民众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杀戮、断粮、疾疫等直接造成人口死亡的事件上,对饮用水这种间接导致人口死亡的要素,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实际上持续性的饮用水缺乏以及饮用水污染,与战时瘟疫流行有直接关系,对人口造成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战火波及之处,普遍发生瘟疫。官私文献中相关记载颇多,如光绪《甘肃新通志》就辟有专门的篇目来记录相关内容^⑦。同治六

年(1867年),崇信县“瘟疫流行,城乡传染殆遍,棺木俱穷,多以芦席卷埋”^⑧。会宁南石沟人李振西,“回乱后徙居侯家川,筑堡寨,招流民,(同治)十三年(1874年)冬大疫,死者甚众,疠气方炽,人莫敢殓尸,皆远避野宿,振西延道家修醮逐疫,施棺掩尸,疫遂息,流民复安乡邻”^⑨。战后各地方志中大量旌表出资殓尸善行的记录说明,民众虽然不清楚瘟疫流行的机理,但从最朴素的现象出发,已经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另一方面,这些记载也说明,战争期间可能有更多的尸体无法得到及时掩埋。西北冬日苦寒,黄沙白雪间,骸骨暴于野,易遭狼犬啃食,对生者尚无大碍。但夏日酷暑,暑气熏蒸,尸体极易腐烂,污染水源,影响就极显著。如礼泉县城被困期间,“生擒者俱戮于城门北墙下,时方炎暑,臭气袭人,于是疫疠大作,日有死亡”^⑩。

官私文献中关于战时缺水问题的记载较少,究其原因,主要可能是大部分地区饮用水虽然缺乏,但却并不像粮食那样会完全断绝,不至于对生存构成直接的威胁。尤其是战争的核心区域,比如关中、河西、宁夏、河湟等处,或有较多的地表径流,或有较为丰富的浅层地下水,饮水相对比较丰裕。以关中为例,处于战争核心区的沿渭部分州县地下水位较

① 光绪《陇西分县武阳志》卷四《人物·忠节》。

② 民国《重修整屋县志》卷八《纪兵篇》。

③ 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178页。

④ 光绪《临潼县续志》卷上《殉难人物》。

⑤ (清)孔易昭:《平定关陇纪略》卷一。

⑥ 《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戊辰)上谕》,《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三八。

⑦ 光绪《甘肃新通志》卷二《天文志·附祥异》。

⑧ 民国《重修崇信县志》卷四《志余》。

⑨ 光绪《甘肃新通志》卷七三《人物志·孝义》。

⑩ 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310页。

浅,便于打井取水。一份川陕总督查朗阿奏报陕省凿井事宜的史料显示,早在乾隆初年,陕西的西、凤、同、汉四府及邠、乾二州,已开水井总数高达14万余眼^①,其数量相当惊人。甘肃各处情况类似,“地理调查表”对各村镇治城的水井情况多有记载,其数量亦相当庞大。虽然这些水井大多用于农业灌溉,后世亦多有倾圮废弃,但就解决人畜饮水问题而言,应该不是难事。而这一战争中心区域饮用水看似较为丰裕的区域特例,往往被视为整个区域的普遍特征,从而忽视了战时饮水普遍困难的事实。

四、粮食与城守: 泾阳城与凤翔城的不同遭遇

对于那些遭到长期围困的治所城市而言,粮道绝断,给养无法及时补充,缺粮问题尤为严重。守城者对于粮食的重视程度与绸缪之策,则直接影响了最终能否坚守成功。其中,泾阳县城与凤翔府城的案例就极为经典。两城被围的经历大率相同,但这两个城市最终一破一保,结局完全不同。

泾阳地处泾水之阳,关中腹地,土沃民丰,自古农业发达,是陕西著名的产粮之区,与高陵、三原等县号称关中“白菜心”。同治西北战争爆发之初,泾阳绅民就有贮粮守城的倡议。然而,泾邑头号绅士致仕太常寺卿聂沄以粮多招寇为由横加阻挠,故开战之后城内储粮并不多^②。同治元年六月初杨文治等人率众攻城,百计皆施,均未奏效。乃用绳索环绕城间,系铃拴狗,以为预警,将全城困为铁桶,内外联络遂完全断绝,粮、米、盐、茶等生活日用所需无法补充。及至七八月间,也就是围城仅一两个月之后,城内就开始乏食,出现严重饥荒,一斤面粉的价格

涨至白银15两,仍不可得,小民以皮屑、槐豆、药物、牛马皮煎煮充腹,守城兵勇则杀马屠狗以充饥。

一首泾阳民间流传的口歌,相当形象地描绘了当年围城之时城中缺粮之凄惨景象。歌词如下:

只困得城外头闲草不见,
城里头老和幼谁不熬煎。
一斤面十五两铜钱半串,
一个饼五两五半串铜钱。
拿上钱买不到一点米面,
大半人没度用饿死里边。
买卖人有货物不能化变,
手拿着白银子恨地怨天。
到如今你不当半碗茶饭,
倒不如将银钱掷撒满院。
哭了声苍天爷谁不可怜,
衙门里无度用方子想遍。
将好马一个个杀得吃完,
.....

城外头逃难的没有事干,
他一心梦想着要赚大钱。
一个个在泾阳四路送面,
谁若是要送面命不周全。^③

周围各县小民贪利前往泾阳卖粮之事,民间口述史料中有较多记载,如据礼泉县耆

① 吕小鲜:《乾隆初西安巡抚崔纪强民凿井史料》,《历史档案》1996年第4期。

② 聂沄,字雨帆,泾阳西关人,道光年间举人,朝考七品小官,以礼部主事擢军机章京。后因穆(彰阿)党被参,归籍办团练。聂反对储粮备战,民间多称其意在屯粮居奇,以获私利。清末县人著《春冰室野乘》亦有记载。《泾阳乡土志》有聂沄传记,但行文颇为随意。由此观之,传闻或有一定真实性。总之,不管是何原因,战时泾阳城内储粮较少,当是事实。

③ 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154—155页。

老刘文德称：“咱县情况还比较好些，有时还可开城，只有泾阳县围困得厉害。听说泾阳城里的人，头枕着银子，结果还饿死了。因回军围城，水泄不通，城内无粮，故当时咱县的很多人曾冒险到泾阳去卖馍。泾阳城内的居民，先把钱或银子从城上吊下来，卖馍的再把馍吊上去。因之卖馍很发大财，去者争先恐后，但为了赚大钱，好多人也在泾阳城外送了命。”^①刘文德老汉小时常听大人讲述当年的战事，也曾见过当年泾阳守城的炮手董生辉，他所述内容虽未亲身经历，但也有一定的可信度。小民贪财冒死，零星资食，与城内所需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显然无法解决根本问题。泾阳围城期间，周围官军及各县民团曾多次试图前往泾阳馈粮，但在围城后的半年多时间内，仅三原同德粮局募夫数百，由官军及乡勇千余护送，侥幸成功一次。返程兵勇，又遭劫杀，泾阳自此援绝^②。同治元年十二月初四日五更城破，绅民男妇死者极众。

与泾阳县城相比，凤翔府城被围时间更长，从同治元年八月底到同治三年正月初，前后长达一年四个月有余，远远超过泾阳县的七个月围城。回军自围城以来，挖地道，埋地雷，竖云梯，用炮轰，百计皆施，皆未成功。同治二年三月后，乃采取久困之计，于“城西南数里外，挖掘长壕，壕外用大绳绕匝，系以铃及猛犬。人触之，铃响犬吠，贼拦杀无可脱者”^③。绳外营寨遍布，四面合围，水泄不通。其攻城与困城之策与合围泾阳之时，简直如出一辙。

和泾阳县城相比，凤翔府城内的人口更众，所需粮食更多。然城内直至同治二年四五月间，也就是回军绳索围城之后，才开始出现普遍乏食的情况，时人称常社诸仓告罄，油薪日用诸物亦匮乏，公私迫蹙，民间多以糠粃菜食充饥^④。此后直至七月上旬，也就是围城整整 11 个月之后，城内才真正开始出现比

较严重的饥荒。史载其时全城“杀骡马，掘鼠雀，搜罗菜根、树皮、药材、海菜，啖啖疗饥。……且骡马不易得，有以犬肉作伪者。炬油早用完，市厘屯蓄之膏蜡并燃尽，城守暗中摸索，附城内外树木先伐为薪，濯濯一光。每当晦夕阴宵，几成冥界”^⑤。即便如此，凤翔府城仍然又坚守了五个月之久，直至陕西提督陶茂林援军赶到，最终解围，全城得免。凤郡能够坚持 16 个月之久，终得保全，究其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中，粮食充足，尤其是官私粮资各有所出，应该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战时凤翔城内粮食充足，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首先，粮食丰收，官仓足额。凤翔乃岐雍之地，为关中著名产粮之区，道咸以来二十余年，没有发生严重影响粮食生产的水、旱等自然灾害。史称“遍地麦禾，收成丰稔，官则仓库足额，民则盖藏充盈。夜不闭户，路鲜丐者”^⑥。所言虽多夸张之词，但战前多年风调雨顺，粮储丰富，亦是史实。城内官仓储备足额，战时自然有从容周旋的余地。守城之初，绅民皆不愿捐粮助战。团勇丁壮及其他守城人员粮饷，尽发常平社仓以济之。小民私心守财以备自需，乃人之常情，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形势尚不甚危机，官粮较为宽裕，尚不至于从民口夺食。这一举措，实际上

① 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 294 页。

② 光绪《三原县新志》卷八《杂识》。

③ 《清》张兆栋：《守岐纪事》，中国史学会主编：《回民起义》第 4 册，第 279 页。

④ 《清》余畴澍：《秦陇回务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回民起义》第 4 册，第 237 页。

⑤ 《清》余畴澍：《秦陇回务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回民起义》第 4 册，第 249 页。

⑥ 《清》余畴澍：《秦陇回务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回民起义》第 4 册，第 253 页。

起到了储粮于民的效果,民藏每家不多,但分布面广,犹如沙中之水,虽涓涓细流,但不易枯竭。汇而计之,总量也不少,这为城内日后久持,提供了基础。

其次,措施得力,民仓较丰。凤翔战事晚于东府各州县,战守经验多可借鉴,可以预为筹备。同治元年八月初,凤翔战起,小民扶老携幼纷纷涌入城中避难,郡守张兆栋下令只许携带资粮者入城^①。这一举措,极有先见之明。小民仓皇逃生,虽然不可能携带过多资粮,但至少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自给,不至于出现临潼、泾阳那种围城不久即发生米荒、小民多被饿死的惨剧。凤翔控扼陇蜀咽喉,商业繁盛,富室众多,仅东关一带,街市就十数里,坐贾云集,百货充牣。这批富户避难入城,大多有备而逃,粮资充足,远超个人所需,极大地补充了城内储备。因此,战时城内民间储粮较足,且在围城之初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未受到官府盘剥挤榨。粮资散于民间,小民因此多得活命。

再次,间或贸易,略有补充。除了城内公私自有粮食,同治二年春夏间城中正乏食之际,凤翔府城亦获得了短暂的贸易机会,粮食及其他日用所急需之物,得稍许补充。根据当年参与守城的凤翔知府幕僚余澍畴讲:“时城中常社诸仓告罄,油薪日用诸物亦匱。公私迫蹙,忽有乡民负贩至。始甚疑焉,继而察之,方知逆巢麀聚日众,急需茶布。盖逆之需茶也,甚于饔飧。其布,为生者衣,为死者捆,回俗使然。当贼初起时,东路城市诸货多运寄郡城,茶布尤多。及时,周围千百里市井凋残,故彼许投回乡民贩货,来城交易,夹带粮食,罪无赦。其人得逆暗号,问答相符,即放行。盖逆意以掳积鸦片、盐斤及日用无足重轻诸货,以资其所急需。而我亦以货易货,无所损益。且可混杂出入侦察,遂许其互市。

每日黎明,贩者至南关,由城各营弁勇占验,开栅给籤而进。至城下,重价市之,抚慰备至。由南城委员经理,从城关悬以上下,市毕,收籤放出。由是城中货物稍有来源,白米亦间有升斗暗藏布市者。”^②凤翔南关这种以物易物的活动,持续时间较短,前后不过月余。至七月初九日,回军再次攻城,双方死伤较多。此后,贩者裹足,交易终止。交易期间,粮食仅为夹带而来,数量极其有限。即便如此,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有限粮食,仍然部分地解决了城内断粮的燃眉之急,为之后凤翔城仍能坚守数月之久,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五、战争状态下产粮之区的乏粮之困

西北原多产粮之区,尤其关中、宁灵、兰巩及河西等处,均土沃民丰,粮产丰富,不但可以自给,而且能够对外大量输出。现有研究显示,战争爆发前,在陕、甘两省的主要产粮区,与往年相比,严重影响粮食生产的旱、涝等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并无太大变化^③,部分地区,比如前文所述之凤翔等府,甚至风调雨顺,粮食连年丰收。大量青壮从军,虽然直接减少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对粮食生产造成重要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战时大量人口死亡,也极大地减少了对粮食的

① (清)余澍畴:《秦陇回务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回民起义》第4册,第222页。

② (清)余澍畴:《秦陇回务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回民起义》第4册,第237页。

③ 张连银:《自然灾害、仓储与清代甘肃的粮价(1796—1911)》,《兰州学刊》2014年第8期;邵天杰、赵景波:《关中平原近200年来洪涝灾害研究》,《干旱区研究》2008年第1期;赵景波、李艳芳、董雯、王娜:《关中地区清代干旱灾害研究》,《干旱区研究》2008年第6期。

总体需求。两者相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乏粮之困,那何以在同治战时各地普遍出现较为严重的缺粮现象呢?

究其原因,首先当然还是战争本身导致的粮食减产。大兵来时,小民四散逃生,根本无暇顾及农事,往往延误农时,无法按时播种与管理。而没有成熟的粮食因双方争夺而草草收割;已经成熟的粮食,也往往因为战争无法及时收割。如同治元年八月中旬,华州“难民乘隙收麦、拾棉、摘柿、焚纸钱、拉畜者多被杀戮”^①。在这种情况下,粮食较平常年份严重减产是不可避免的。

除此之外,市场化的粮食运销体系也是造成战时粮食短缺的重要原因。清代商品粮贸易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加繁盛,各地区各阶层人们所需的粮食,大部分都依靠粮食市场进行调剂^②。陕、甘两省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之一,粮食运销比较频繁,市场发育相当成熟。比如陕南汉中、安康两个府,清中以后,所产粮食多顺汉水而下,运销往襄阳、汉口等处^③。兰州产的小麦,顺黄河而下,中卫之稻则可逆挽^④。关中地区产粮可外销者更多,顺渭水东出潼关,运销晋、豫各省。陕西省的咸阳是全省重要的粮食集散地,本省粮食在此集中,运销山西的数量相当庞大。仅乾隆八年(1743年)七月至八月“运往出境者已不下二十万石”^⑤。

清代商品经济发达,银钱需求量大,不论普通农户还是地主富农,凡依仗土地为生者,日常生活、婚丧嫁娶、生产用具以及输贡纳赋等一应开支,所需银两大多来源于粮食出售。清人自称“输贡赋则需钱,以供宾客修六礼则需钱,一切日用蔬菜柴盐之属,岁需钱十之五六。钱何来,惟粟耳”^⑥。督抚奏折、地方史志以及个人文集等各类文献中,均有大量相似记载。对于贫户来说,“家无二日之储,

所食之粟,每日杂买”^⑦是很普遍的事情;而一般农户“欠岁则糊口不给,屡丰则谷贱如泥,公赋私交之费,俱无所出”^⑧亦是常事,是以终岁稍有所余,便会立即变卖,以补所需;只有少数富户,家中余粮较多,但囤积居奇,其最终目的,也是待价而沽,以求谋利。

清代延续了前朝的储粮政策并有所发展,在地方设立常平、社、义等官民仓廩,以平抑粮价、济荒救灾。虽然制度完备,奖惩兼施,但实际运作中,捐纳征收,杂买补,事繁时长,易生弊端。乾嘉以后,朝廷虽三令五申,非但无法禁止,相反愈为严重^⑨。及至战前,西北官私仓廩有名无实,储粮亏空现象非常普遍。同治皇帝三年上谕:“近来军务繁兴,寇盗所至地方,每以粮尽被陷。推其原故,总由各州县恣意侵挪,任令米粟空虚,遇变无所依赖。”^⑩八年再谕:“军兴以来,各省仓谷,率多空虚。”^⑪从中可见,问题是相当严重的。

小民售粮换钱,大量粮食外运,直接导致民间少有积储,鲜有盖藏。与此同时,官私仓廩,储粮亏空,皆不足持。而西北战事起于同

① 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81页。

② 邓亦兵:《清代前期的粮食运销和市场》,《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

③ (清)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一四《艺文下》。

④ (清)梁份:《秦边纪略》卷四《靖远卫》。

⑤ 《乾隆八年八月二十五日陕西巡抚塞楞额奏》,《历史档案》1990年第3期。

⑥ 乾隆《嵩县志》卷一五《食货》。

⑦ 《圣祖实录》卷一五九,“康熙三十二年六月庚子”条,《清实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49页。

⑧ 乾隆《栖霞县志》卷一《疆輿志·物产》。

⑨ 李映发:《清代州县财政亏空》,《清史研究》1996年第1期。

⑩ 《穆宗实录》卷九二,“同治三年正月庚午”条,《清实录》第47册,第43页。

⑪ 《穆宗实录》卷二六二,“同治八年七月癸酉”条,《清实录》第50册,第634页。

治元年夏四月中旬,离麦收还有一个多月时间,新粮尚未收获,旧粮已经告罄,正处青黄不接之时。大战起后,刀兵相向,粮道梗阻,内粮不足,外粮又不至,即使官军亦时常为缺粮所困,而小民则更万难赈济。在这种状况下,大范围粮荒已不可避免,由是大量人口死于饥饿。

六、结 论

中国历史上战争是人口在短时间内剧烈波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历经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逐渐累积起来的人口,因为战争,很可能在短短的十几年甚至几年之内就损失殆尽。对同治西北战争的研究表明,战争期间导致人口严重损失的真正原因并不是战争本身,而是与战争相伴而来的严重的灾荒与瘟疫。而粮食短缺与饮用水污染,又恰恰是战时灾荒与瘟疫流行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同治西北战争期间,战事频繁,大量青壮

人口脱离生产投入战争,导致农时延误,农事无法正常展开,粮食产出严重不足。另一方面,过度商品化的粮食市场使得战区粮食供应体系极为脆弱。因此,战火波及之处,普遍发生严重粮荒,大量人口因断粮而饿死。更多人口则因为长期饥饿导致体质严重下降,极易感染疫病。与此同时,大量尸体未能及时妥善处理,尤其是众多小民投井自杀,污染饮用水源,是疫疾流行的重要诱导因素。所有这些因素最终叠加传导到区域人口上,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

粮食与饮水均为人生存所必备,这两项战略物资在城市防守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其中,粮食的重要性尤其突出。通过泾阳县城和凤翔府城这两个典型案例,可以看到,守城者对于粮食的重视程度、存粮数量和储粮方式是防守成功的关键要素。相比之下,战时民间分布式的粮食存储方式比官方集中式的粮食存储方式更能持久,也更有利于城市防守。